

第二十二章

历史

香港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蜕变，
与时俱进，民生逐步改善，
社会日益进步。时至今日，
香港已成为全球领先的国际金融贸易中心之一。

考古发现

香港考古研究始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沿海多处地点出土的古代人类活动遗迹，证明本港历史可追溯至六千多年前。从考古学角度来说，香港或许只是华南文化体系的一个小部分，而学者对这方面所知仍属有限。有香港考古发掘显示，香港与广东在新石器时代和青铜器时代的文明发展步伐一致，同样受到中原文化影响。

最早期的文化在公元前四千年出现，其间经历环境转变，海平面由低于目前水平100米处逐步上升，淹没沿岸一片片的广阔平原，形成今天的海岸线和环境生态。在该地区生活的人必须适应环境，否则便遭湮没。

考古发掘发现两个主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层。青铜器约在公元前一千五百年出现，这是香港史前最后一个阶段。虽然当时没有广泛使用青铜器，但香港考古遗址曾有矛头、箭镞和戈等精巧青铜兵器出土，也发掘到刀、鱼钩和斧等青铜工具。在原赤蠟角岛过路湾、大屿山东湾和沙螺湾、屯门扫管笏，以及南丫岛大湾和沙埔村出土铸造青铜器的石范，足证本港有铸造青铜器。

青铜时代陶器的印纹，大都与新石器时代晚期陶器的几何图案一脉相承，但其中的“夔龙”、“夔纹”则是该段时期区内特有的纹饰。

早期中国文献称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居民为“越人”。因此，至少有部分本港史前先民可能是“百越人”(各类“越人”的统称)。

此外，在大屿山石壁、濠西洲、蒲台岛、长洲、东龙洲、港岛大浪湾、黄竹坑和歌连臣角等地点，也发现了几何图案和状似动物图案的石刻，很可能是本地先民所刻凿。

秦(公元前二二一至二零六年)汉(公元前二零六年至公元二二零年)两朝挥军南征，平定岭南。南迁的汉人不断增加，对原住民产生种种影响，这从本港出土的汉代钱币可见一斑。不过，这段动荡时期的最重要遗迹，还是一九五五年在深水埗李屋村和郑屋村附近发现的完整砖室墓。这座古墓内的陪葬品为典型的汉代明器，被推定为东汉初期至中期的古迹。在大屿山白芒、濠西洲、马湾东湾仔及屯门扫管笏进行的发掘工作，都在文化层出土各类汉代陶器、铁器和大量铜钱。在旺角渠务工程工地也发现四个陶罐。

本港甚少发现汉代以后的古迹，而海滩常见的圆拱形灰窑的发掘和研究结果，证明唐代(公元六一八至九零七年)的本地住民曾使用石灰，有助了解时人的生活情况。石灰用途广泛，是当时很有价值的商品，占有重要的经济地位。

公元十三世纪，元兵南下，宋朝覆亡，香港与这段历史有深厚的渊源。九龙城的宋王台石刻，大庙湾天后庙附近的宋代石刻，石壁、米埔和奇力岛出土的宋代窖藏钱币，启德旧机场出土的建筑遗迹，以及在启德、九龙大磡村、大屿山稔树湾、石壁和元朗鳌磡石等多处发掘到的宋代青瓷，都是这个时期的文物。

近年的考古研究提供了一些新资料，有助进一步探索明代(公元一三六八至一六四四年)和清代(公元一六四四至一九一一年)的本地历史。有关的研究包括分析在大屿山竹篙湾出土的大量明代青花瓷器，这些瓷器在公元十六世纪初制成，手工精巧，是输往东南亚和西方诸国的外销瓷器。二零零一年竹篙湾出土了包括房基在内的更多明代文物，显示当时有人在该处聚居。大埔碗窑遗址的考古调查发现，本地可能早在明代已有窑工开始制造青花瓷器。香港的瓷器工业一直传承至二十世纪初，历经三百多年。二零零零年及二零零八年在扫管笏遗址进行的发掘，发现合共九十多座明代墓葬，陪葬品包括瓷器、铜钱和铁器，为研究明代本地居民的生活提供了新资料。

东龙洲清代炮台的发掘，令人们得悉炮台的内部结构，以及清末屯驻香港的官兵所使用的日常物品详情。九龙寨城的考古勘察，发现了寨城的城门遗迹和南门上两块刻有“南门”、“九龙寨城”字样的石碑。启德发展计划的环境影响评估工作，也发现了龙津石桥遗迹。石桥在一八七五年建成，连接九龙寨城与海岸，用作登岸码头。

通商港口

由于香港地瘠山多，水源缺乏，早期的居民认为香港并非安居乐业的好地方。当时香港只有村民约3 650人，散居于20多条村落；另有渔民2 000人，栖宿于港口的渔船上。港

口是香港唯一的天然资产，维多利亚港位置优越，处于通往远东的贸易通道，不久便成为与中国进行转口贸易的枢纽。

自一八四一年英国人前来定居之后，香港逐渐发展为商业中心。十八世纪末，英国人支配了广州的对外贸易，但主要由于中英文化不同、观点迥异，且外商只准在商馆区范围内活动，不得入城，故他们对当时的情况并不满意。

初时，中国在贸易得利，银元大量流入。不过，自一八零零年开始，鸦片贸易蓬勃，形势即告逆转。清廷早在一七九九年明令禁止输入鸦片，但自一八三四年东印度公司丧失对华贸易的特权后，外商为图暴利，纷纷加入鸦片贩运行列，中国银元外流的情况更趋严重，而吸食鸦片更严重影响中国人民的健康。有见及此，清廷在一八三九年三月派遣钦差大臣林则徐赴粤，厉行禁烟。林则徐抵粤一周，立即派兵封锁商馆，不准任何人离开，又断绝粮食供应，直至外商交出全部鸦片为止。他着令外商和船长具结，以后不得再输入鸦片，违者正法。英国商务监督义律和其他英商被围困六星期后，被迫下令缴出鸦片共20 283箱。

义律其后向英廷详细报告，并决定在接获指示前暂停通商。英侨于是撤离广州，暂居澳门，但因澳葡总督声言难以保障他们的安全，英侨在一八三九年夏季全部退居香港港内的船舶上。

英国远征军在一八四零年六月开抵中国，发动第一次鸦片战争(一八四零至一八四二年)。双方且谈且战。林则徐在初步谈判失败后遭撤职，由琦善接任钦差大臣，并与义律达成协议，战事才告一段落。

一八四一年一月二十日，义律根据《穿鼻草约》的谈判内容，提出割让香港岛。英国海军于一月二十六日在水坑口(即今日上环荷李活道公园一带)登陆升旗，香港正式成为英国属土。同年六月，义律把土地分段出售，香港开始有人定居。两国政府都不承认《穿鼻草约》。中国视割地为奇耻大辱，举国震怒，琦善被解京查办。英国外务大臣彭玛斯顿勋爵也大表不满，认为香港是“一个杳无人烟的荒芜小岛”，不足以代替通商条约。

彭玛斯顿勋爵严厉谴责义律漠视训令，并以砵甸乍爵士取代义律。一八四一年八月，砵甸乍爵士抵达香港，决心以武力解决问题。一年后，砵甸乍爵士挥军溯长江而上，直迫南京，中英双方最终在一八四二年八月二十九日订立《南京条约》，战事才告平息。

当时，英国维新党政府下台，新上任的保守党外务大臣阿巴甸勋爵在一八四一年向砵甸乍爵士发出新训令，撤回割地的要求。砵甸乍爵士在冬天停战时返抵香港，对香港的发展甚为满意，在订立《南京条约》时不仅订立通商条约，而且要求中方割让香港。

清政府还须开放广州等五个地点作为通商口岸，有关的通商条约其后并入一八四三年十月签订的《虎门善后条约》。根据条约，华人获准自由到香港经商。

租借新界

中英双方对前订条约的诠释各执一词，最后引发第二次中英战争(一八五六至一八五八年)，两国在一八五八年签订《天津条约》，英国可派遣外交代表到中国，战事暂时结束。英国第一任使节是香港首任布政司布鲁司爵士，他奉命前往北京呈递国书，但途经大沽突遭炮轰，战火于是在一八五九年再起，到一八六零年才平息。

从本港早期照片所见，参与第二次远征的英军曾在九龙半岛结营，他们发现当地环境适宜，遂拟保留作驻防之用。经英国驻广州领事白加士爵士与两广总督交涉后，英国获得九龙半岛南端(北至界限街)连同昂船洲的租借权。一八六零年，战争结束，两国订立《北京条约》，九龙半岛正式割让予英国。

及后，欧洲各国和日本也相继向中国要求租借土地。一八九五年中日战争结束，德、法、俄三国曾为中国说项，自此需索更多。局势趋于紧张，英国遂认为必须取得香港邻近土地的控制权。

根据一八九八年六月九日在北京签订的条约，中国同意把九龙界限街以北直至深圳河的地方和235个岛屿，租借给英国，为期99年。中国军舰仍有权使用九龙城的码头，中国仍然保留该处的行政权，“惟不得与保卫香港之武备有所妨碍”。一八九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英女皇会同枢密院议决撤销这项条款，由英国单方面接管九龙城。在此之前，英国人已在一八九九年四月接管新界，初时仍有零星反抗，但后来终告停止。新界遂成为香港的一部分，但与市区分开管理。

初期发展

香港初期发展并不顺利，不良分子麋集，罪行猖獗，热病和台风威胁居民的生命财产，但出乎意料，仍然有很多华人移居这个由外国人统治的小岛。一八五一年，香港有人口32 983人(华人有31 463人，占总人口的95%)；一九三一年，人口增至878 947人(华人有859 425人，占总人口的97.8%)。

香港渐渐成为中国移民的聚居地，以及与海外华侨通商的中心。使用本港港口的远洋船，由一八六零年的2 889艘增至一九三九年的23 881艘。香港主要与中国通商，因此不得不顺应中国习惯，在一八六二年采用银元制。中国在一九三五年放弃银元本位，香港也随之改变币制。

香港政制采取英国海外属土常用的模式，总督由英廷任命，行政立法两局议员由政府委任，大多数为官守议员。立法局第一批非官守议员在一八五零年获委任，至一八八零年才有首位华人议员(新加坡出生的律师伍才(又名伍廷芳))；行政局在一八九六年开始有非官守议员，而首位华人议员(周寿臣爵士)则在一九二六年获委任。长期以来，香港总商会和非官守太平绅士这两个选举团体，都有权各自提名一人为立法局议员，但这项安排已在一九七二年终止。

在港居留的英国人数度力促成立自治政府，但英廷一直不予首肯，称香港华人占多数，难以由少数欧籍人士统治。一八八三年政府成立卫生局，并由一八八七年开始以选举方式选出部分成员。卫生局在一九三六年改组为市政局。

最初英廷有意从中国内地借调官员管理香港的华人，但这种并行的政制并未认真实施，而且由于罪案日多，最终在一八六五年被废除，并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取代。同年，英廷大幅修订香港总督的训令，规定“如任何法例对亚非裔人士有所禁制，而欧籍人士则不受其限者”，总督不得批准施行。政府采取自由放任政策，把香港发展为开放营商贸易之地，一切秉公办理。

当时，香港的公用事业相继开办，计有一八六一年成立的香港中华煤气公司、一八八五年的山顶缆车公司、一八八九年的香港电灯公司、一九零三年的中华电力公司、一九零四年的电车公司等。至于九广铁路，则在一九一零年建成。自一八五一年起，香港陆续进行填海工程，较重要的是一九零四年完成的中环填海工程，以及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九年间进行的湾仔填海工程。现在的遮打道、干诺道和德辅道，都是在中环填海之后辟建出来的。

一八四七年，香港政府推行公立学校教育制度，补助中文学校的经费。一八七三年，主要由教会营办的义学也纳入政府补助计划内。香港华人西医书院在一八八七年成立，当时有两名学生，其中一人是孙中山先生。书院在一九一一年扩展成为香港大学，开设文学院、工学院和医学院。

自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推翻满清政府后，中国长期动荡不安，不少人来港避乱。中国虽曾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但未能藉《凡尔赛和平条约》收回德国在山东的租借地，加上战后国民党推行急进政策，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动荡局面一直持续。

中国当局力争废除外国凭藉条约取得的一切特权，外国货被抵制，不安的局势蔓延至香港，一九二二年发生海员罢工事件，一九二五至二六年间在广州发生的事件还演变为省港大罢工。当时，英国为排外运动的主要目标，但反日情绪不久便取而代之。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与第二次世界大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条款。一九三一年，日军占领东三省，并企图吞并华北省份，终于导致一九三七年日本全面侵华。一九三八年，广州沦陷，大批难民涌入香港。估计在一九三七年抵港的难民约有十万人，一九三八年有50万人，一九三九年则有15万人，令香港人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增至160万。难民抵港的高峯期，估计约有50万人流离失所，露宿街头。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日本空袭珍珠港，轰炸美国军舰，正式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差不多同一时间(香港时间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军取道中国大陆，进攻香港，英军被迫撤离新界和九龙，退守港岛。

当时守军包括香港义勇军，苦战一星期后，因众寡悬殊，难扭劣势，终在圣诞节投降。

日本占领香港三年八个月。沦陷时期贸易停顿，货币贬值，粮运不继，政府服务和公用事业大受影响。不少人避居中立的葡属澳门，澳门政府也尽量收容。日治末期，为解决粮荒，日本人驱逐大批居民离境。

本港居民虽然备受压迫，但大部分仍拥护抗日阵线。一九四二年二月，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在西贡黄毛应村成立，他们四出攻击日军的据点和海上航运路线，也与盟军合作，营救战俘。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投降。消息传来，沦陷期间被囚赤柱监狱的布政司詹森(后获封爵士)随即组织临时政府。八月三十日，海军少将夏 爵士率领英国太平洋舰队抵港，成立临时军政府。一九四六年五月一日，总督杨慕琦爵士回任，香港正式恢复民政统治。

战后发展

战时，不少华人由香港返回内地。日本投降后，他们纷纷回港，每月几达十万人之多。香港人口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原已减至约60万，但到一九四七年年底却激增至180万左右。一九四八至四九年间，国民党政府在国共内战中失利。很多人从内地涌入香港，人数之多，破了历来纪录。一九四九至五零年春，有数十万人移居香港，他们主要来自广东省、上海和其他商业重镇。至一九五零年年中，估计全港人口已达220万。此后，香港人口不断增加，一九七一年达400万，一九八零年达500万，一九九四年达600万，目前已超逾700万。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大量人口涌入香港，寮屋数目因而激增。一九五三年圣诞节，一场木屋区大火令53 000名居民无家可归。政府急须安置灾民，香港的公营房屋计划亦由此展开。时至今日，本港已有周全的公营房屋计划，提供公共租住房屋(公屋)单位和

资助出售单位。二零一九年第四季，约有30%和约15%的人口分别居于公屋单位和资助出售单位。

韩战爆发，联合国于一九五一年对中国实施禁运，香港经济停滞不前，加上人口激增，单靠港口已不足以维持繁荣。随着纺织厂相继设立，香港的制造业开始兴起，产品种类逐渐增加，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已扩展至生产人造纤维和成衣，所输出的纺织品和成衣占本地产品出口总值约一半。

一九六六年，内地爆发文化大革命，香港局势日趋紧张。一九六七年，本港发生连串社会骚乱，市民生活大受影响，经济陷于瘫痪。幸而情况在年底受到控制，本港得以恢复平稳发展。

香港的转口港业务不断发展，与内地的贸易增长尤为迅速。此外，香港的旅游业日益蓬勃，交通也大为改善。在地理环境上，香港是内地的天然门户，每年从香港启程或过境进入内地的旅客愈来愈多。

政府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推行两项高瞻远瞩的计划，影响深远，逐步塑造出香港现今的面貌。首先，为配合十年建屋计划，政府在一九七二年决定在新界发展多个新市镇。在随后的20年间，香港共发展了九个新市镇。目前，香港大约有47%人口住在这些新市镇，纾缓了市区的发展压力。政府在一九七六年制定《郊野公园条例》，为设立郊野公园及特别地区提供了法律依据。现时，香港有24个郊野公园和22个特别地区，约占香港土地面积40%，保育不同的自然生境。

一九七五年，越战结束，大量越南难民涌入香港。截至二零零零年最后一个难民营关闭为止，共有超过20万名越南难民来港，当中超过143 000人获安排移居海外，约72 000人被遣返越南。

迈向新世纪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随着新界租借期限将于一九九七年届满，香港开始面对不明朗的前景。一九八二年，英国首相戴卓尔夫人访华，与中国领导人商讨香港前途问题，揭开了中英政府持续两年谈判的序幕。双方最终于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九日就香港问题签署《中英联合声明》。《联合声明》阐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包括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决定。

香港特区于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于同日生效。《基本法》是香港特区的宪制文件，规定香港须施行的制度，并以法律的形式，订

明“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等重要方针。为落实这些方针，《基本法》订明，香港特区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变。

香港经历的转变不限于政治方面。多年来，制造业的生产重点由当年简单而劳工密集的产品，转移至今天精密先进的高增值产品。工业家看准珠江三角洲丰富的土地和人力资源，遂跨越边界，把生产基地向北扩展，营运总部则仍然留在香港。这种经营模式有助推动区内经济发展，促使香港蜕变成一个以服务业为主的经济体系。二零一二年，本地产品出口占出口总额不足2%。

政府致力改善和增建基础设施，以配合各项发展。四通八达的道路和铁路，一流的港口和机场设施，令香港成为一个现代化都会。新建的公路令偏远地区的交通大为改善，铁路网络也陆续扩展。位于赤鱘角的香港国际机场，在一九九八年落成启用。

经济基础日趋稳健，政府得以逐渐增加教育、社会福利、卫生和其他民生方面的开支，总额由二零零九至一零年度的2,890亿元增至二零一九至二零年度预算的6,078亿元。

由二零零八年起，政府为入读公营学校的所有学生，提供12年免费的小学和中学教育；同年，职业训练局也免费为中三离校生提供全日制课程。此外，专上教育也继续获政府大幅资助。

本港的社会福利服务更臻完善和普及。过去十年，政府的社会福利开支由二零零九至一零年度的404亿元增至二零一九至二零年度预算的972亿元，增幅超过一倍。

香港的医疗体系在战后初期建立，以应付不断增长的人口。其后，政府致力扩展医疗体系，以保障公众健康和为全港市民提供医疗护理及设施。一九九零年，政府成立独立运作的医院管理局，负责管理所有公立医院，并基于不应有人因经济困难而得不到医疗服务的原则，提供由政府大幅资助的公营医疗服务。截至二零一九年年底，该局辖下有43家公立医院和医疗机构、49家专科门诊诊所及73家普通科门诊诊所。

香港有完备的劳工法例，以保障雇员的权益、福利和职业安全与健康，求职人士和雇主可免费享用就业和招聘服务。雇员再培训局于一九九二年成立，现时为年满15岁而教育程度在副学位或以下的人士提供培训及再培训课程和服务，以配合不断转变的劳工市场需要，并为各行各业提供新的人力资源。